

财经学术文丛

“十二五”辽宁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2024）研究成果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View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Explanation from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基于政治干预视角的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来自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

黎文靖 ◎ 著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财经学术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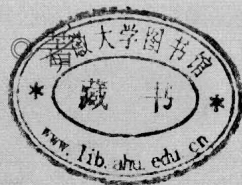
“十二五”辽宁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2024）研究成果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View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Explanation from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基于政治干预视角的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来自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

黎文靖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黎文靖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于政治干预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来自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 / 黎文靖著.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6

(财经学术文丛)

ISBN 978-7-5654-1221-9

I. 基… II. 黎… III. 企业责任-社会责任-研究-中国 IV. F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424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 (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 (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 (0411) 84710523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153 千字 印张: 6 1/2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智慧 龚小晖 责任校对: 那 欣

孙冰洁 周 晗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钟福建

ISBN 978-7-5654-1221-9

定价: 24.00 元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802024）对本书的出版资助。

作者简介

黎文靖

男，1979年7月生，广东茂名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兼职博士后研究员，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薪酬制度设计与业绩评价、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等；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多项研究课题，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如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SSCI)、Business Strategy and Environment (SSCI)、《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会计研究》、《财政研究》、《财经研究》、《南开管理评论》、《中国会计评论》等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论文被顶级国际学术会议（美国会计学年会和加拿大会计学年会）接受做分组报告。

摘 要

我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公德缺失、不公现象普遍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06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公平正义和生态文明建设,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书的研究也基于这样一个制度背景展开。

本书运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干预与寻租(Rent-seeking)理论,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研究政府干预、寻租等重要制度特征对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决策、投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基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本书以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公司慈善捐赠、环境绩效等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为切入点,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全面研究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从而为现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政策制定、市场监管、企业决策、公众宣传等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甚至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助益。

本书首先分析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发现来自政府的政治干预是我国转轨经济下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制度特征,在研究我国企业行为决策时,应当将这一制度特征考虑在内。政治干预的制度特征会导致企业为了应付政府的压力,谋求更大的利益,从而进行政治寻租。此外,我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政治锦标赛,这会带给地方政府官员很大的压力,要为了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而努力,当上级政府强调和谐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时,下级政府会要求辖区企业追求社会责任。最后,法律执行较弱是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征,

表现在我国环境保护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律执行较弱，这导致了我国现在较为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透支的局面。

在政治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制度环境下，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同于西方企业的实践，并非企业一种自发的决策，更多表现为由上至下政府推动的结果，比较符合政治经济会计学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做是新兴市场中政府的政治干预下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行为。考虑到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受到的政治压力和干预程度不一样，因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和决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了检验本书提出的政治干预理论，本书从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公司慈善捐赠和企业环境投资（资本支出）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的逻辑思路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决策，例如整体水平、慈善捐赠和环境投资，究竟是由政府的政治压力驱动的还是由经济利益等因素所驱动，并且考察社会责任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解释其中的影响机制与途径。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的实证结果如下：采用来自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2007 年的数据、所有行业上市公司 2008、2009 年的数据，本书发现：第一，控制了文献中所归纳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特征后，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与公司社会责任水平正相关，意味着在转轨经济的新兴市场中政治干预理论更能够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而相反的，非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与公司社会责任水平负相关；第二，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员工规模、债务水平和托宾 Q 值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和水平；第三，在控制了影响企业业绩的变量后，本书发现公司社会责任水平与企业会计业绩正相关（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中），而与企业市场业绩负相关（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上述结果表明，在新兴市场环境中，所有权类型或者政治干预可能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量，应当纳入分析框

架中。

基于公司慈善捐赠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捐赠金额更大。我们同样发现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捐赠金额更大。上述结果与研究我国重大灾难，如 2008 年的汶川地震时公司捐赠所发现的结果并不一致（Zhang et al.，2009）。此外，实证结果表明资源约束理论和行业竞争理论均无法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从经济后果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公司慈善捐赠和未来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慈善捐赠对于公司未来的销售收入增长没有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公司通过慈善捐赠，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例如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等，这支持了政治商誉理论。

基于企业环境投资的实证结果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环境资本支出投资；在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增加环境资本支出，而非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环境资本支出没有显著的关系；与以前年度相比，2006 年以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加大环境资本投资，而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变化。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国有企业的环境资本支出与托宾 Q 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资本支出与托宾 Q 值无显著关系。总体而言，我们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影响我国企业环境资本投资的最为重要因素是政府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区别政府的政治压力与法律压力的差异。

从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慈善捐赠和企业环境投资三个角度的实证结果都表明，政府的政治干预程度和政治压力是影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决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政治经济会计学下的政治干预理论是解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比较恰当的理论。

前 言

本书运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干预与寻租（Rent-seeking）理论，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研究政府干预、寻租等重要制度特征对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决策、投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基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本书选择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公司慈善捐赠、环境绩效等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为切入点，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全面研究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从而为现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公司社会责任的政策制定、市场监管、企业决策、公众宣传等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甚至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助益。现将本书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创新之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等介绍如下：

一、研究动机与研究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保持接近 10% 的速度增长，GDP 从 1978 年的 2 683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58 791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以粗放式为主，即通过投入资源的增加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力优势，来谋取 GDP 的高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透支、社会公德缺失、价值体系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形成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金钱至上、贫富分化等现象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以影响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为例，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表示，中国环境状况“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态势未变，环境

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也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环境污染总体尚未得到遏制,环境监管能力依然滞后,形势依然严峻”。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资讯网络(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CIESIN),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所合作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显示,在全球132个国家中,我国2000—2010年的环境绩效在108~116名之间徘徊(见表1),并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潘岳副部长提到的中国环境状况“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态势相吻合。

表1 2000—2010年我国环境绩效指数及排名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PI	41.24	42.57	42.97	42.50	42.04	41.92	41.87	41.87	42.06	42.24	42.24
排名	111	108	108	112	113	114	114	116	115	116	116

食品安全是环境污染之外的又一严重问题。根据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在民调涉及的124个国家当中,中国人的幸福度排名第92位。88%接受调查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远离“美满幸福”的标准,其中生活成本和房价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让人不安的食品安全是导致民众幸福指数较低的主要原因^①。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再到毒胶囊和塑化剂等,这一系列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都不断地提醒民众我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早已变得无奈,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目前受到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还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① 常东亮.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J/OL]. 中国经济报告, 2011(7). [2011-07-28].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728/170710224005.shtml>.

贫富分化严重等现象。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悬殊。目前,我国收入最高 10% 群体和收入最低 10% 群体的收入差距,从 1988 年的 7.3 倍已经上升到 23 倍,行业差距达到 8 倍,地域差距近 3 倍^①。2012 年 5 月 29 日,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1 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24 556 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 452 元,从数据上看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行业的分析表明,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 9 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 2 万元左右,两者相差 4 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 35 562 元,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 1 万元出头,两者之比为 3.03 : 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 8 倍。从地区比较来分析,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 48 493 元、37 923 元、36 558 元和 36 000 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 26 800 元、22 313 元、22 020 元和 20 677 元。数据表明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

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公德缺失、不公现象普遍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对未来的信心。2011 年 10 月 29 日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 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②。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的《2011 年

^① 该段主要统计数据来源于人民网的新闻报道,请参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 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023/c1001-19352501.html>)。

^② 2011 年 5 月至 9 月,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面对面访问了全国 18 个重点城市的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调研共获得 980 份有效问卷,受访人群的平均财富达到 6 000 万元以上,平均年龄 42 岁。白皮书以上述调查数据为基础。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财经新闻板块。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近似和更精确的数据：当前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是 50 万人，人均拥有可投资资产 3 000 万元人民币，加在一起的可投资资产是 15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个人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陆企业家中，有 27% 已经移民了，还有 47% 正在考虑移民，加在一起，就是有 74% 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①。对于这些富豪和精英为何热衷于移民，吴晓波认为有三个理由：高品质的生活、子女教育和财富的安全感。后两条理由涉及我国的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与本书主题关系不那么密切，在此不做深入讨论。对于掌握财富的精英而言，高品质的生活不会出现在一个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的国度内，因此，移民成为必然的选择。此外，具备技术与能力的高端人才，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总是感觉到不公平，有能力和选择的话，他们也会想办法离开这个社会。很显然，掌握财富的精英和掌握技术的高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资本、技术、人才的外流，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些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责任的现象与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重视上述这些问题，政府的执政思路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渡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增长质量。标志性的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① 吴晓波. 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到海外? [EB/OL]. [2011-12-16]. <http://finance.qq.com/a/20111216/001332.htm>.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至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执政政策。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内容来看，旨在解决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目标中所谈到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是为了解决社会所存在的机遇不平等和贫富分化问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的目标，针对目前社会中道德水平低下、食品安全等问题；而“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的目标则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密切相关等。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其报告中也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要求，这都反映了社会和谐成为当前时期的主旋律。由此可见，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政府最为重要的政策方针之一，本书基于当前我国政治环境和经济制度，从企业微观角度研究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学术界很早就已经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从企业微观层面进行的相关研究则是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公司社会责任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沈洪涛、沈艺峰（2007）对西方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起源与演变做了回顾与述评，20世纪60年代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上；20世纪70年代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的内涵，但研究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其他概念上，如企业社会责任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和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中心是企业社会绩效，以及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关于

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企业伦理理论 (Business Ethics) 等研究; 进入 21 世纪, 企业公民理论 (Corporate Citizenship) 成为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主流。以这些思想为基础,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其内涵已经从经济责任发展到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等多元化社会责任, 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话题和实践活动。

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方兴未艾, 已有很多学者关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 从理论基础、评价体系、责任计量、价值影响等方面做了初步探索, 但一个重要的、可能的缺陷在于: 现有研究绝大部分直接沿用西方成熟市场环境中的已有理论成果, 如利益相关者理论 (陈宏辉、贾生华, 2003; 张兆国等, 2009)、可持续发展理论 (许正良、刘娜, 2008) 等, 缺乏深入分析我国转轨经济特征基础上, 构建符合新兴市场制度特征的理论框架, 并在此框架下开展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伦理道德形成和决策行为等方面的差异 (Ge and Thomas, 2007; Lam et al., 2008), 导致两者在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解释、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不应忽略这些差异的影响。并且现有文献也认为应该多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 (Amato and Amato, 2007; Muller and Whiteman 2009)。

此外,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 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完全建立, 大多数资源与价格仍处于强制性的计划管理之下, 许多领域与行业尚属于严格的申报、审批约束之下, 并且有许多限制性的领域尚未打破自由进出的门槛, 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仍然是我国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强大的政府干预的力量让经济的运行并不服从于经济必然规律本身, 而是服从于政治决策的周期性。总体而言, 目前现有文献 (包括西方公司社会责任

文献与国内研究) 仍缺乏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公司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 特别是缺乏考察政府干预、政治寻租等转轨经济制度特征对公司社会责任决策、经济后果等方面的影响, 尚未形成一个适用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制度环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框架。本书结合政治干预、寻租等方面的制度特征, 对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进行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研究目标

基于上述的研究意义分析, 本书拟研究企业进行公司社会责任决策的动机与经济后果, 即分析企业在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 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财务政策与经营战略的影响以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一步, 本书将区分不同的产权结构、政治关联等因素对比分析不同政治干预程度下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动机和经济后果的差异, 并且本书将深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 具体目标如下:

第一, 从财务状况等经济因素和制度环境等非经济因素角度考察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决策和投资的影响因素;

第二,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投资对于企业融资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影响, 比较产权结构和政治关联是否会显著地加强或削弱上述关系;

第三,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投资对于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途径, 对比不同政治压力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并在实证中控制以往研究忽略的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

第四, 综合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之间的作用机制, 譬如企业环境投资与慈善捐赠等, 检验社会责任各维度作为缓解政治压力、降低政治成本的工具方面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第五, 在政治干预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 检验自愿披露理论与社会政治理论对于

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适用性。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并非简单地重复西方关于社会责任的已有研究，而是通过结合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特征，考察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与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一）政治干预的定义问题

政治干预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如何定义它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核心问题。本书试图借鉴政治经济学、公司财务学和会计学等领域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构建勾勒企业所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的实验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类型变量，我们可以预期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更高的政治干预，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样本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比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有更强的政治干预；二是所有权结构变量，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制衡度等，我们可以预期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国有股比例越高、前十大股东制衡度越弱的企业，受到的政治干预程度越高；三是企业政治联系变量，如董事长、总经理的政治背景等，我们预期，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受到的政治干预程度更高；四是制度环境变量，如政府干预指数、地区 GDP 增长等，我们预期处于经济比较落后、政府干预比较严重地区的企业，会受到更多的政治干预。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数据收集

从下一章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困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社会责任的定义与数据获取。目前文献中关于社会责任水平和信息披露的很多数据，绝大部分是由作者自己定义的，并无统一的标准。参考现有文献，根据本书的研究需要，本书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定义企业社会责任。

在研究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时，本书采用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08 年 12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数来衡量上市公司的整体社会责任水平，并考察政治干预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因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仅发布了一年的数据，因此关于社会责任整体水平的研究样本也仅有一年。

考虑到公司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本书将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由于公司在年报中会披露当年的慈善捐赠数据，我们在公司年报中“营业外支出”的附注中收集公司慈善捐赠的金额，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1—2010 年度。

目前我国尚无法规要求企业遵循标准的格式进行环境绩效、环境投资与环境信息方面的披露，所以相关的数据库并不存在，并且数据散见于年报和其他报告（如社会责任报告）当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通过组织研究助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敏感的 8 个行业所有上市公司，从其 2001—2010 年报中搜集相关的环境信息。我们从“在建工程”附注中的借方投入去搜集企业环境投资的数据，并以此作为本书研究企业环境绩效的数据支持。

（三）企业环境决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机制和途径分析

本书不仅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还必须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与途径。从文献来看，影响途径有很多，包括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刺激创新、提升员工士气、改善顾客关系等。从理论分析来看，我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响应政府号召，增加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以获取政府控制的政策性资源，从而提升公司价值，例如贷款、政府补贴、行业准入等等。现有文献所发现的这些途径集中于企业的经济动机追求上，而本书理论所预期的这些途径，更关注企业的政治关系的维护。

影响机制比较多，在单一的研究设计中无法涵盖所有途径的检验。本书结合制度环境特征，针对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慈善捐赠、企业环境绩效等），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价值可能的途径进行检验，确定发挥作用的机制，验证本书